

赠阅

阜阳地区党史资料

(第十一期)

中共阜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一九八四年六月

目 录

回 忆 录

我党在国民党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中的活动

- 兼及“政一队”和各工作团在皖北……………王希克、张景华（1）
- “政一队”与阜阳党组织……………朱鸿翔（13）
- 省工作团在皖北始末……………傅 曼（18）
- 对阜阳专区动员指导处的回忆……………张子夫（21）
- 忆抗日初期太和县的革命斗争……………张一萍（22）
- 抗日初期的阜阳工作团……………王庆华（28）
- 涡阳的抗日救亡运动……………王笑伟（30）

专 题

- 阜阳抗战中学……………阜阳市委党史办 张振标（36）

重 大 事 件

- 太和“七·一九”惨案……………太和县委党史办王彦峰（39）
- 亳县二区惨案始末……………亳县委党史办王如珍（42）
- 蒙城青抗会事件……………蒙城县委党史办慕占民（43）

我党在国民党第五战区抗敌 青年军团中的活动

——兼及“政一队”和各工作团在皖北

王希克 张景华

第一：青年军团始末简介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为扩大桂系势力，号召抗日，网罗青年，根据民主进步人士王深林（山东诸城人，大革命以来靠拢我党，曾任广西大学教授、山东政协副主席）等人的建议于徐州成立第五战区青年战地训练班，遂即扩大成为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通称青年军团），一九三八年一月间开赴河南潢川，进行训练。李宗仁任团长，张任民任中将副团长，潘宜之任少将教育长。下设五个大队，一个女生队。约于一九三八年三月间，成立艺术队，由各大队爱好文艺的学员参加，集中在信阳附近鸡公山训练。整个军团号称五千人，实际上约三千多人。

学员大都是苏鲁豫皖流亡青年，其中主要是学生、中小学教员和教育行政人员。山东第三路军司令韩复矩被枪毙后，第三路军政训处的政训员和一部分教官也合并入青年军团。

青年军团的教官大都是聘请来的，也有从山东政训处转来的。教官中有匡亚明、许德源、张百川、安翰华、温朋久、佟子实等进步人士。还有郝惊涛、许大川等人，另有少数东北军、西北军军官任军事教官。

政训处长刘士衡、政训处宣传科长王深林，在宣传科工作的有臧克家、王寄舟、王景鲁。王深林同志对我党和“民先”（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活动，作了掩护和支持。各大队的中队长都是桂系军官，广西人。女生队指导员左秀泉（女，党员，当时无组织关系，回到我根据地后逝世）。

青年军团在潢川训练约四个月，训练结束后，组成实习队，分配到苏鲁豫皖各省进行战地工作。

一九三八年三月下旬，根据李宗仁的决定组成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山东大队和江苏大队，四月底又派出安徽大队（后来撤到河南）。当时青年军团主要力量分配在豫东南八县，每个县一个实习队，由第五战区直接领导。全称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抗敌青年军团××县实习队，总队设在潢川。约于六月间，所有各县实习队均改为政治队。全称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第×大队第×中队（由政一队至政八队）。

一九三八年七、八月间敌人进攻武汉经过豫东南各县时，各队有不少人离散，人数

均有减少。一九三九年夏，李宗仁决定撤出河南各政治队，集中经营安徽，命豫东南各政治队到安徽立煌集训，属廿一集团军司令兼安徽省主席廖磊领导，于是缩编为三个政治队，集训三个月，于九月间，政一队派赴阜阳，政二队派赴皖东，政三队派赴寿县。一九三九年冬，廖磊死后，李品仙继任安徽省主席，桂系日益反动。一九四〇年初，在反共高潮中决定再次集训各政治队。我党则用各种方式，秘密组织各队撤到我抗日民主根据地。

第二、青年军团成立时我党即派去党员和“民先”开展工作

抗战开始，我党曾决定在山东韩复矩部开展工作，淞沪战争爆发后，曾动员大批平津流亡学生留在以余心清为处长的第三路军政训处。在济南集训时，党的负责人是邹育才支书，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济南南关外。第二次集中时，邹育才调走，交杨司法（现在上海）负责。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训处人员撤到济宁时，杨司法调走，交王愧中负责。王愧中当时介绍陈兰徵（陈北辰）入党，并负责“民先”工作。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末，政训处人员撤到曹县时，杨司法来找王愧中、陈兰徵，传达山东省委决定：韩复矩枪毙，政训处内党员与“民先”立即秘密全部撤出，转到徐州李宗仁办的青年军团去工作。王愧中、陈兰徵带领全部党员、“民先”十余人化装夜奔陇海路柳河站，偷攀李宗仁从开封回来的专车到徐州。

王愧中、陈北辰到徐州经杨司法通知与山东省委负责人张霖之接头。张指示除派马聘德、余××到五十一军作兵运工作，魏佑铸（现任兰州军区副政委）到山东单县参加建立游击根据地工作外，全部党员和“民先”都到五战区青年军团，并介绍青年军团政治处宣传科长王深林是党的可靠朋友，除组织关系外，什么都可谈。青年军团到潢川后，由河南省委领导并交待王愧中接头的暗语。

一九三八年一月间青年军团迁到潢川，随后留在山东曹县的第三路军政训处教官与政训员全部参加了青年军团，其中有北平学生赵湘泉（赵敏）、徐绵宜（徐勉一）等人。原在政训处的濮思澄和派到五十一军去的马聘德等人，也先后来到青年军团。

至此，组织派遣到青年军团的党员与“民先”有：濮思澄（蒲成，中国大学学生，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副书记）、陈兰徵（陈北辰，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学生，曾任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马聘德（马成德，平大法商学院学生，原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赵湘泉（赵敏，女，平大法商学院学生，曾任教育部司长）、徐绵宜（女，平大女子文理学院学生，现任安徽××学院党委书记）、王愧中（王希克，平大法商学院学生）、林梦森、马凤栋（都是北京学生，曾在东北军学兵队工作，林梦森现在某建筑工程局任局长，马已逝世）、余琦、何其、王立言（女）、杨文毓（女）、田竞存（女）、孙伦（女）、赵君哲（均系北平中学生）约十六七人，除少数党员外大多是“民先”队员。

“民先”队员到潢川后，大都先后入了党，这批平津流亡学生的党员和“民先”，是在青年军团中开展党的工作的骨干。

一九三八年一月间，青年军团到潢川不久，山东省委派曾在三路军政训处的党员魏震（北京朝阳大学学生）来与濮思澄、王愧中、陈兰徵接头，决定王愧中带来党的关系交濮思澄，濮思澄负责党的工作，尽量隐蔽活动。王愧中、陈兰徵负责“民先”工作。

陈兰徵任“民先”队长，公开活动可广泛一些，“民先”队员中发现可以入党的对象，介绍给濮思澄去发展。

第三：青年军团中党的组织关系

到青年军团后，魏震带来的党员名单，除王愧中同来的平津学生陈兰徵、马聘德、余××、林梦森、马凤栋、杨文毓、孙伦、余琦、何其等人外，还有徐州来的党员佟子实（徐州人，当时任教官）、丁兆兰（丁曼君，女，徐州人）等共约党员十余人，组成党的总支部。总支书记濮思澄，委员佟子实、沈××。尔后逐步在各大队、女生队建立了党支部。

党总支兼第一大队党支书，由濮思澄、沈××负责。第二大队支部由李洪渠负责，第三大队、第四大队、第五大队也指定了一定的负责人，女生队由杨文毓负责。

二月间河南省委派苗勃然来潢川与濮思澄接头，尔后成立豫东南特委：书记苗勃然，委员有濮思澄、周晓乐（北京中大学生）。苗勃然传达特委的任务是准备建立豫东南游击根据地，保卫大武汉，并要求在青年军团内大量发展党员和“民先”，为建立根据地作准备。那时，从青年军团到实习队，以及后来改称为政治队的党的领导骨干，在思想上是明确的，就是就地坚持，为建立敌后游击根据地作准备。与此同时，“民先”也与在武汉的“民先”总队部建立了联系。

一九三八年五月青年军团结束训练后，豫东南特委改组，苗勃然为书记，濮思澄（宣委）、徐志雨（组委，潢川人）、周晓乐、冯纪鑫为委员，分配在豫东南八县的青年军团的各实习队的党组织，仍受豫东南特委领导。那时，各县党的工委（后改为县委）大多依靠青年军团实习队（后改为政治队）党组织开展工作。（一九三九年夏秋，豫东南特委由河南划归豫鄂皖区党委领导）

第四、我党在青年军团的活动

青年军团内政治斗争很复杂，各党各派均有活动，各种政治倾向（如托派、改组派）都有。主要的则是三大势力：国民党桂系、国民党中央系、我党三系之间的斗争。

桂系在行政上是主导力量，李宗仁曾幻想像蒋介石办黄埔一样办青年军团。他曾说，蒋有中央干训团，共产党有抗大，我有青年军团。由此可以想见他的政治意图和创办青年军团的用心。因之他对青年军团下了很大血本，除自兼团长外，派中将张任民为副团长，少将潘宜之任教育长，大队长中也有少将。除女生队外，中队长以上均是桂系军官，政训处主任刘士衡常以左倾面貌出现。政治课则是以宣扬广西的民主政治和“三自政策”（自治、自卫、自给）为主要内容。但当时正处在抗日高潮中，为笼络迎合青年左倾情绪以兼蓄并容为号召，还聘用一些进步教授和左倾的政治教官（如匡亚明等人），还用了一个靠拢我党的民主进步人士王深林为政训处宣传科长。桂系那时主要地怕国民党中央系插手，但对我党的活动也有防范。如不许张贴拥护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标语，说这是共产党的口号。三月间曾派了第五战区参议刘某（解放后曾任政协委员，前年逝世）秘密约见陈兰徵、王愧中（未暴露党员身分）要求解散“民先”，说李司令长官对各种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都开放，但对任何组织不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中央系

都绝不能容忍，如黄公度是他亲外甥，因有组织活动的嫌疑，也枪毙了。意在说服我们不要搞组织活动（其实，我党中央已决定解散“民先”）。

学员中的国民党中央系即国民党的顽固派也有活动，如原是铜山县的教育局长刘某，宿县的中学校长胡秉初、教员张美生等都是原教育界的国民党CC分子。他们则宣传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污蔑国共合作是共产党投降等滥调。他们既反共，也反对桂系。他们的土壤是一些青年学生中的正统观念。在各种学生活动中则与我党争夺领导权。

开始时我党党员和“民先”不足二十人，虽然力量很小，但在豫东南特委的领导下，很快与来自各地的进步青年（其中包括失掉关系的党员）结合起来，经过组织读书会〔（读书会的领导成员是三三制的，有濮思澄、王愧中、陈兰微（均是党员）、刘斗奎（不久入党，曾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哲学部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已逝世）、刘公望（现名苏林，当时靠拢我党）、胡秉初、张美生（国民党中央系的）等七人〕介绍进步书籍，召开各种座谈会，以及新文化拉丁化研究会（濮思澄负责）等活动，特别是经过个别串连，在学员中展开了积极活动介绍参加“民先”，很快在学员中形成领导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个别串连作用，如通过政训处宣传队张景华掌握了这个宣传队的领导（这个宣传队是由淮阴与上海一批进步青年组成的，思想比较纯洁，其中有胡绍祖、周太和、马文干、王映、张秉栋、朱流、杨青年、王初、朱霞、黄积云等人均先后参加“民先”而后入党的），通过山东济宁的朱鸿翔、李德观、宋启鹤、李洪渠等人结识了济宁来的一些青年，经过徐州的马广志（现名李杨，在南京）、贾士珍（曾任苏州市委书记）、李其祥（逝世）、李祥生、李震海、卢雨道（卢炎，在上海）等人结识了丰、沛、肖、杨的一些曾参加过进步党或共青团的青年，通过刘斗奎（他是北大学生，先流亡到宿县的）、张时雨（张炎，现任济南铁路局局长）结识了宿县来的一批青年，经过庄坤（庄重，现任政法报主编）结识了海州地区来的青年，……这些人都是先介绍加入“民先”而后入党，成为我党在青年军团中开展进步活动的骨干分子。

还必须提到的是当时进步教官如匡亚明、张百川、安翰华、许德源、温明久、佟子实（党员）等人对我党和“民先”的活动支持作用很大。除了他们讲课的影响外，他们住处都是我党与进步青年串联活动的重要场所。还有政训处宣传科长王深林，对我们的支持很大，我们需要青年军团领导上解决的事，都是通过他去疏通的。

鉴于当时桂系与国民党中央系即蒋系的矛盾很大，极力排斥学员中蒋系的活动，青年军团中我党组织在政治上采取利用蒋桂矛盾、利用桂系暂时的“开明”争取桂系，打击国民党中央系，争取学员活动中的领导权，扩大我党的影响、发展进步势力的方针。在组织上则采取秘密活动与公开活动严格分开，党组织绝对隐蔽，经过“民先”积极引导学员中各进步活动的方针。

应当说明，桂系当时虽然觉察到“民先”的活动，但始终未觉察我党的组织存在。一直到一九四〇年我党领导青年军团仅存的三个政治队完全撤退到解放区之前，即使对我党活动有所怀疑，也未完全肯定，最后我们能够全部安全撤退到根据地，就说明了一点。

青年军团成立不久，我党在学生活动中即取得了支配地位。如一九三八年二、三月间，军团请梁漱冥来讲话，内容荒谬，当天晚上我们发动，第二天讲话刚开始，就把他哄下台来。又如徐州会战后，李宗仁路过潢川，亲自接见学员代表讲话，到场的多数是我党党员、“民先”或靠拢我党的进步分子。在青年军团结束前后，学员的几次分配，我党的意见，都能经过宣传科长王深林而被采纳。尔后，桂系在学员中作为干部提拔的，也都是我党党员。可见，桂系在青年军团中所依靠的力量，实际上却是我党的骨干。

党在组织建设方面，到青年军团结业时，党员发展到四、五十人，“民先”已发展到近三百人。尔后“民先”的大多数被吸收入党。在发展党员和“民先”时，我们警惕性很高，特别对桂系有关的人，不敢轻易信任，采取了关门主义的态度。另外对进步教官如匡亚明、张百川、安翰华等人虽然来往密切，但也不发生组织关系。对年岁较大有社会经验的人，也不轻易发展。纵观青年军团直到尔后的实习队、政治队，其中的党员曾有不坚定分子，但未发现有坏人混进来。我党组织比较纯洁，始终未受到破坏，这是重要原因。

第五、青年军团结束后组成实习队、政治队时期党的活动概况

（一）一九三八年四月间，青年军团结束前，李宗仁即决定派出山东和江苏两个大队。当时党决定主要力量留在河南和安徽。因此派到山东大队去的只有几个“民先”，没有党员。江苏大队根据本人的要求，只派了党员俞铭璜（曾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已逝世）和许家屯（曾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沈絮等少数人。江苏队离开潢川后均与青年军团的党组织断了联系。

（二）一九三八年四月卅日青年军团训练结束时，军团决定去安徽一个大队，其余留在豫东南八县。

当时党决定王愧中、刘斗奎等人去安徽大队（到安徽后编为省动委会四个工作团去皖北各县），徐州失守后，安徽大队撤回河南，党的主要力量王愧中、刘斗奎、陈雨田（陈雷，在安徽曾任地委书记）还有涡阳动委会指导员杨思九（现任中央纪委副秘书长）等四十余人加入了固始队，其他人分散到其他各军系或疏散。

青年军团的主要力量留在豫东南八县，每县组成一个青年军团实习队（简称为商城队、固始队、息县队等）我党亦决定将党的主要力量留在这几个县，又按几个重点县分配党的力量。如商城队，中队长佟子实（党员），队员有马广智、朱鸿翔、贾士珍、李震海等人。

固始队，中队长王立行（党员），队员马聘德、张景华、马文干等。

信阳队，中队长郭濯岸（第三党），队员濮思澄、李其祥、庄坤、张传栋（曾任福州市委书记）、宋启鹤。

息县队，中队长张百川（靠党最紧的教官），队员陈兰徵、何其、李洪渠、崔更生（崔苏）等人。

女生队的主要骨干赵湘泉、杨文毓、李德观等分到潢川、经扶（新县）。光山、罗山队去的党员、“民先”较少。

每个队有四个助理，由学员中选配，如我党骨干濮思澄、陈兰徽、张景华、马文干、马广智等人都是各该队的助理。

青年军团学员分配到各县后，党的骨干仍保持互相联系，党的关系均转到各县。县没有党的组织者，则由青年军团中的党员组成县委的组织。上面则统一受豫东南特委的领导。

如前所述濮思澄参加特委为委员。息县有周小乐兼县委书记，陈兰徽参加了县委。固始县没有党组织，由青年军团实习队中党员组成县工委，马聘德任书记，张景华任委员。后改为县委，马聘德任书记。马聘德去延安后，王愧中任书记。刘斗奎、张景华和新发展的当地党员阮崇山、李士衡任委员。

一九三八年七、八月，日寇进攻武汉时，突然窜犯豫南各县，战况紧急，国民党的军队、政府仓惶逃窜，青年军团各实习队（后改为政治队）受到冲击，也大部疏散。各队的党组织则按上级以前的指示精神，尽可能团结可以团结的人，坚持留在敌后，为建立根据地作准备。当日寇退出时，我党领导各政治队都先于国民党政府回到各县城，恢复秩序开展工作。由此我党则成为各实习队（政治队）的中坚。各实习队（政治队）表面上虽然仍是桂系建制，实质上我党已经完全掌握了领导权。至于党的力量不强的光山、罗山队，基本上被冲垮。

在此之后，各政治队的党组织，除作一般的抗战动员外，有的队还争取了国民党的地方政权和军队的部分权力。如固始队除已取得第三区公所从区长到区员的全部任职外（刘斗奎任区长），又完全囊括了县公安局（党员牛仁周任局长，后因腐化调离，桑雨润等任局员，还由我党动员农民十余人作为局武装）和县长汪宪兼司令的游击队的政治部全部工作。区员和十余武装人员均由我党选派（中队的副白宝珍任主任，王愧中、张景华任副主任）。在建设地下秘密党方面也取得进展。刘斗奎在三区的农民群众中发展四、五十名党员，其中有在苏区时入党的党员阮崇山、王绍武等。其他区也个别的发展一些党员，城中发展了学生李士衡为党员。固始队撤离该县到立煌集训时建立了阮崇山为书记的完全由该县党员组成的地下县委，继续坚持工作。

在一九三八年八月豫东南沦陷，固始队辗转于立煌关王庙、双河、麻河一带活动时，党组织和以新四军兵站为掩护的豫鄂皖区党委取得联系。由此固始县委归豫鄂皖区党委直接领导（不久豫东南特委也划归豫鄂皖区党委领导）。之后，县委书记王愧中参加了由郭述申传达六中全会精神和毛主席在会上的报告的豫鄂皖区党委扩大会议（豫东南特委书记苗勃然也参加了），会上区党委书记郑位三作了学习冀察晋边区，建立大别山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此后，在豫东南各县活动的各政治队，即按这个决议精神进行工作。由于日寇没有再侵略，除建立发展地下党以外，对抓武装、抓政权等活动，都未起作用。

自从接受豫鄂皖区党委直接领导后，固始县委和固始队以及其他各队经常传达区党委指示，党的思想水平和组织纪律性都有所提高，我们还经常将党费，个人捐款以及可以掌握的固始队一部分行政费用（因中队长是党员，队费全由党掌握）支援了区党委。同时也开始将不宜于继续在国统区活动的一些同志如杨思九等（杨思九到皖东根据地后

曾任盱眙县长)撤到我根据地。另外也有区党委需要的干部调出,如张景华、张时雨(张炎,曾任桂林铁路局、济南铁路局局长、政委等职)调到安徽省军事训练团作秘密工作。

第六、青年军团——各政治队转移到安徽

一九三九年六月青年军团——各政治队被调到安徽立煌(金寨县)集训。由于两个情况,一是桂系考虑到豫东南八县政权属于河南国民党中央系,企图放弃河南全力经营军政大权都掌握在桂系手中的安徽(桂系廖磊为廿一集团军司令兼安徽省主席,总部与省政府均在立煌);一是怀疑政治队内有共产党的活动,决定调豫东南各县政治队到立煌集训。

为应付集训,防止桂系怀疑,各政治队事先在党内作了传达部署,一切进步刊物、书籍和文献一律隐藏。过于暴露可能引起麻烦的党员如赵湘泉(女)等同志直接转移到我皖东(后为淮南)根据地。

各队到立煌集训时,整编为三个中队。即商城队(原政一队于三八年底已调到阜阳)与固始队(原政二队)合并为政一队(这个队包括在豫东南沦陷时由息县队来的一些人和后来由濮思澄带来的信阳队庄坤、宋启鹤、张传栋、梁绪修等二十余人和少数光山队罗山队的骨干),这个队人数较多。息县队编为政二队,潢川队、经扶队合并为政三队,因人数较少,党的力量较弱,将固始队陈雨田、王子英(新华社时事手册编辑)等十余人,充实政三队。

在集训期间,第一大收获是整顿了党组织,这时豫鄂皖区党委决定成立青年委员会(青委)负责领导各青年团体中的党组织,书记为汪胜文,委员郑少东(郑忠,负责广西学生军的党组织)、曾谋(负责省动委会所属各工作团)、×××(负责安徽军事训练团内党的组织)、王愧中(负责各政治队内党的组织)。

各政治队成立党支部,政一队刘斗奎、张景华,政二队陈兰徽,政三队李德观(女,后与何德润结婚,现在广西)。各支部着手解决党内团结,各队合并后党与群众的团结等问题,并个别发展一些党员。同时也传达学习了豫鄂皖区党委有关指示,总结前一段经验,党的思想组织水平有所提高。

第二大收获是重新取得桂系的信任,一方面由于党组织活动更加谨慎保密,另一方面而且很重要的一方面是集训班的主任何德润(贺希明,广西人,过去参加过党领导的进步活动,曾在青年军团政训处工作过,得到桂系上层的信任)作了许多维护我党活动的工作,给了很大支持,他根据我们的建议,曾将活动甚力的一个CC分子调离集训队,特别是一再向桂系领导反映政治队内没有共产党。因之,后来省主席廖磊到集训班讲话说:“有人说我们里面有共产党,我就不相信;就是有共产党,经过我的训练,也会听我的,”表示对我们的信任。

经过这次集训我党的战斗力有所增加,桂系对政治部增加了信任,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青年军团——政治队是仅次于广西学生军的桂系嫡系,对尔后开展工作,甚为有利。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话:工作团(指省动委会所属工作团)见到乡长区长平起平坐,青年军团见到县长专员也平起平坐,国民党中央系的各级党部对我们更是无可

奈何。

九月间，集训结束后，政一队被派到阜阳专区各县（原固始队党员队长王立行养病，原商城队队长尹莘野为队长），政二队派到皖东，政三队派到寿县，何德润任县长兼队长。各队的领导，实际上完全由我党掌握。

在集训期间根据豫鄂皖区党委要求，从政治队内调出不少人到重要岗位。如二队队长张百川任安徽省政府参议，后来任大别山日报社社长。调政一队成员马广智任编辑。林梦森、丁兆兰先后调任省动委会所属工作团任团长，张承云任妇女战地服务团团长，张时雨（张炎）在这之前调安徽军事训练团。在这之后，还有梁绪修由豫鄂皖区党委调去任国民党某县县长（后因故未去成）。

第七、各政治队在皖北、阜阳和皖东的活动

（一）一九三九年九月政一队到阜阳，政三队到寿县，政二队到皖东后，党的领导关系：（政二队、政三队详细情况见陈北辰（兰徽）李德观的回忆）。

按豫鄂皖区党委的决定，政一队成员王愧中除代表青委领导各政治队党组织外，同时负责领导安徽省动委会所属在皖北的几个工作团和妇战团（妇女战地服务团）党的工作。各团的团长都是该团党的负责人，即在亳县的二十九工作团，团长高奕鼎（邓岗，在广播事业局工作）；在颍上县的××团，团长×××；在临泉的三十二团，团长林梦森（由政一队调去）；姚毓慧（傅曼、女、现在北京）当时负责临泉各工作团党的工作；××团团团长王一功（已逝世）××团团团长岳××，××团团团长丁曼君（女，丁兆兰由政一队调去，已逝世）；在涡阳的妇战团，团长都志（女，现在吉林省）。

政一队党支部书记张景华，政二队支部书记李德观，总支书记为刘斗奎。

王愧中负责领导政一队、政二队和各工作团。在组织上属于豫鄂皖区党委，在工作上则接受豫皖苏区党委的领导。一九三九年，豫皖苏区党委在皖北设有特委，书记是周季方。

政治队和各工作团在各县工作时，指定一人与该县委联系（其他党员除在各县党组织中任职者外，不与地方党发生关系），但在工作上取得配合。

一九三九年冬皖北特委撤销后，成立临（泉）、阜（阳）、太（和）中心县委，书记是李轩，组织委员兼临泉县委书记王宇，宣传委员兼阜阳县委书记朱鸿翔，亳县县委书记高峰则直接受豫皖苏区党委领导。政一队、政二队和各工作团的党组织仍由王愧中负责，直接受豫皖苏区党委领导，为使工作上与地方党配合，王愧中兼任中心县委委员。

在寿县的政三队支书李德观，在阜阳的政一队支书张景华，组织委员丁兆兰（后调任工作团团长），宣传委员濮思澄（蒲澄，不久去皖东根据地）。

王愧中由于有政一队区队长的公开身份，活动比较方便，经常去豫皖苏区党委，向彭雪枫、吴芝圃汇报工作，豫皖苏区党委给以指示。王愧中常到各县进行联络。一九四〇年三月，豫鄂皖区党委指示各政治队和各工作团撤退到我根据地，这项撤退工作是由王愧中统一传达部署的。

（二）政一队、政三队党的任务和队员的分配及其活动。

一九三九年九月合编后的政一队到达阜阳，王愧中与皖北特委书记周季方接头。周季方对这股力量，极表欢迎，并传达区党委对皖北工作的指示，大致是说，皖北党的总任务是：一旦敌人占领后，坚持敌后斗争，建立由我党领导的根据地与豫皖苏边区联成一片。为此，当前主要是配合地方党建立与发展地下秘密党的组织，宣传党的主张，扩大党的影响，争取群众，特别是青年和进步人士，靠拢我党。同时尽可能打入国民党政权和军队，抓政权抓武装。皖北的重点，一是亳县，那里靠近我豫皖苏边区；一是临泉，那里地方党比较强；一是阜阳，因阜阳是皖北政治中心、国民党专员公署所在地。此时，经过豫鄂皖区党委，我们的组织关系，正式转到豫皖苏区党委。

经与周季方和政一队党内骨干反复研究确定：

(1) 抓党的建设。派政一队成员朱鸿翔任阜阳县动委会指导员，下有县属工作团，贾士珍任临泉县动委会指导员；后又调陈雨田（陈雷）任寿县动委会指导员。朱鸿翔实际是任地下党阜阳县委书记，另外有马文干任亳县二区区委书记（行政上是亳县二区区员），刘文灿任亳县三区区委书记（行政上是三区区长）。分在各系统工作的党员，有条件的均有发展党的任务。在临泉、亳县和阜阳，都发展了一些党员。

(2) 抓武装。经与桂系阜阳专署专员郭造勋交涉，派张凤鸣（张哲梅，现在武汉市工作）等人到郭造勋兼司令的游击纵队政治部，张任宣传科长；派宋启鹤等五、六人到该纵队的一个支队和所属各大队任指导员。他们在涡阳、蒙城一带活动。

(3) 打入国民党政权。经与郭专员交涉派农超谋（广西人，原政一队区队长，到根据地后任县长，已逝世）任亳县县政府秘书，纵食力任亳县二区区长，刘文灿任三区区区长；两个区的区员，均由我们派出。杜宝镜（方志，曾在农林部工作）、刘冠五（一九三九年冬日寇扫荡亳南时牺牲）等人在县政府工作。任慎修任临泉一个区的区长，佟庆昌（佟刚）等任区员。另王静溪（女，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杨光群（女，地质出版社工作）等在亳县保甲人员训练班任教，刘若华（女，刘若风，现在通讯兵部休息）在临泉县保甲人员训练班任教。另外还派人到阜阳县四、五个乡任乡长。

(4) 为争取青年学生，打入学校。重点是阜阳抗战中学。校长任崇高（教务主任）是有名气的爱国民主人士，我们派徐绵宜（女，现安徽芜湖师院工作）等数人到该校任教。其次是亳县中学，派王静溪、杨光群等人在该校工作（在保甲人员训练班任教后）。

(5) 为开展和掩护地下党工作也进行了争取上层工作和争取进步军人。如我们经常与桂系阜阳行署郭专员来往，也常到郭兼司令的游击纵队司令部与参谋长覃异之（广西人，现任政协委员）来往，以了解桂系军政动向。当时颍上县县长谢骥，寿县县长何德润，他们和各工作团是一同撤到根据地的。在阜阳城内，我们贴过抗大四分校招生广告，有些活动的反映，都是在该司令部通过覃异之了解到的。我们还赠送给覃异之大众哲学看。

此外我们还曾派张景华到国民党五十一军在阜阳的新兵团办过教学队。

(6) 为扩大党的影响，出版刊物和墙报。政一队到阜阳后即不断出大型墙报，曾轰动一时。曾秘密传播新四军四师《拂晓报》。曾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其他进步书刊。最

主要的是用很大精力出版了十六开本刊物《淮流》，共出版八期。发行量逐步增加到近两千份，从皖北抗大到蚌埠附近，在皖北青年中有一定影响。《淮流》主编是濮思澄，编辑张景华、庄坤。不久濮思澄去皖东根据地，张景华还有其他任务，唯有庄坤是全力以赴。从编辑、校对、印刷到出版发行，一包到底。王愧中、刘斗奎、张景华是政论文章主要撰稿人，庄坤、徐绵宜是文艺作品主要撰稿人，张景华还为刊物搞些木刻。

特委书记周季方对刊物很重视，说：《淮流》就是特委的机关刊物，要各级党组织运用它，宣传它。彭雪枫、吴芝圃同志对《淮流》也很重视，如庄坤（庄重）到根据地后即被调到区党委机关报《群众导报》社工作。《淮流》的详情，请见张景华、庄重的回忆。

第八、各政治队撤到解放区——青年军团的结束

一九三九年冬，桂系安徽省主席兼二十一集团军司令廖磊死后，李品仙（桂系另一集团军司令）继任，由于桂系当局和李品仙日益反动，豫鄂皖、豫皖苏区党委即有指示，对我在国统区过于暴露的党员，可相机秘密地撤到我根据地。从这时起，即陆续撤退，一九四〇年春李品仙决定将第五战区所属各工作队和安徽省动委会所属各工作团调立煌集训以肃清共产党。豫鄂皖区党委指示王愧中部署各政治队、各工作团以及与我们有联系的进步青年和民主人士，撤退到根据地。政一队和皖北各工作团撤到豫皖苏即淮北根据地，政二队、政三队撤退到皖东根据地。

由于政一队处于皖北国民党政治军事中心的阜阳，且散布在皖北各县，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较大，撤退早了将暴露我党意图，不利其他单位撤退，而且队长尹莘野，虽然靠拢我党，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主任韦永成是他的舅父，对桂系抱有幻想，特别是有个上尉中队副潘自治，是国民党中央系派来的顽固派，撤退事必须设法瞒过他们，也不可能集中撤退。撤退的顺序大致是：

政二队由陈兰微与皖东党组织联系，先带走全队人员约百人以上，去根据地。

在颍上活动的省动委会工作团团长狄庆楼（狄克东，在军事学院工作）和工作团与阜阳距离较远，也较早撤退。撤退时，带走国民党桂系县长谢骥（到淮北根据地后任泗阳县长，于一九四三年大扫荡时牺牲）和全团二十人。

其次是靠近皖东根据地的寿县政二队。该队队长兼县长何德润（贺希明），虽然事事主动支持我们，但因我们当时认为他是广西人，年龄较长，社会经验丰富，嘱咐李德观和陈雨田部署撤退时，完全背着他，但何德润很精明，他事先装糊涂，让全队撤离寿县，然后带两个县中队武装，以追赶政三队为名，直到根据地附近，令两个县中队回寿县，自己尾随我们，到了根据地。到根据地后入党任县长、专员等职（解放后任广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政三队带走全队近百人（枪）。

再次是在临泉的四个工作团，通过姚毓慧等部署，带走四个工作团（每团廿人）撤退豫皖苏根据地。

较晚的是靠近我根据地在涡阳的妇战团由都志带走全团二十人，在亳县的二十九工作团由高奕鼎（邓岗）带走全团廿人，撤到豫皖苏根据地。

政一队则是分批地或单人的以探亲探家等各种名义，秘密撤退到豫皖苏边区。如刘斗奎是以去外地视察名义，张景华是以办理原固始队长王立行丧事名义带一部分多余枪支秘密到边区。庄重则是将《淮流》第八期编完，带一部分《淮流》到边区（还带些枪支）。

由于《淮流》第八期停刊辞“告别读者”，公开揭露安徽省桂系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考虑桂系发现后会影响到政治队的撤退，故延迟到政一队人员基本上撤退完毕时，于三月廿五日始由邮局发出。王愧中于次日以动员队员去立煌集训为名，陪同尹莘野先后到亳县县政府与二区、亳北等地。直到我豫皖苏边区附近，才公开动员他去边区（尹莘野到边区后，彭雪枫同志亲自接见他，鼓励了他，任他为边区行署教育处长，他执意要回阜阳办理后事，路上被国民党扣留。）

阜阳抗战中学校长、进步人士任崇高，王愧中多次动员他到边区，他当时不理解国民党反共措施而未来，到边区报告区党委后，又派人秘密接他到边区任临时中学校长。

为应付国民党顽固派中队副潘自治，让他带去倾向国民党的队员十一人，带走十一支枪外，政一队全部人员一百余人，枪一百二十余支撤到我根据地。

政一队原有一百三十余人，在这之前陆续调出到其他单位，而后也分别到我根据地，如张承云于一九三九年八月调任在皖东的一个省动委会所属妇女战地服务团任团长，后撤到皖东根据地，一九四一年苏中日寇大扫荡中，在鲁迅艺术学院任代理教导员时牺牲。

还有政一队成员朱鸿翔任阜阳地下党县委书记，撤退时带走县动委会工作人员及所属工作团王庆华（曾在南京军区文工团工作）等一、二十人。

政一队撤退时，唯一的损失是亳县二区、三区工作的队员，撤退时被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暴徒袭击，二区地下党区委书记马文干，二区区长刘文灿牺牲，三区区长纵食力被俘。

总之，根据豫鄂皖和豫皖苏区党委的指示，经青委部署，撤退到根据地的，计：政一队百余人，政二队百人左右，政三队近百人。在立煌集训结束时经交涉每人发步枪一支共约三百余支，都带到了根据地。

六个省属工作团一个妇战团一百四十余人。阜阳县动委会工作人员及县属工作团一二十人。带动国民党县长二人（寿县何德润、颍上县谢骥）县政府秘书一人（亳县农超谋），到边区后均任县长。还有县动员委员会指导员一人及有名的民主人士任崇高。

（政二队、政三队还带走些什么人请见陈兰徵、李德观回忆）。

这三个政治队计三百余人，可以说是青年军团有组织保留下来的“精华”，除个别入全部到了我抗日根据地，为我党我军输送了一批干部。也可以说，这是我党在青年军团——政治队三年工作取得的比较集中的成果。

至此，国民党桂系苦心经营的青年军团的命运，完全结束。

应当补充说明，青年军团成员，除上述集中撤到我根据地的三百余人外，在青年军团我党组织的支持或影响下，零星的经过一些曲折而到我根据地的尚有多起，人数很难计算。如：

1. 一九三八年三月间，由张景华带来一批人组成的青年军团政治处宣传队与学员队合并时，有胡绍祖（在吉林省工作）、周太和（现任中央体制委员会副主任兼秘

书长)、黄积云(女,现任北京市朝阳区政协副主席)、王映(女、在吉林省工作)、王初(曾在公安部门工作)等党员、“民先”十余人,经组织同意去延安,另外还有王立言(女、党员)等多人。

2. 一九三八年七、八月间,豫东南各县沦陷时,各政治队都有一批人去延安。如固始队的马聘德(现在冶金部工作)、王秋霞(女,已逝世)、张承雯(张霖,女、现在北京市工作)、王心荣、李淑民等;息县队何其(党员,已逝世)、李华(女,“民先”,现在北京市中学校工作)等经组织同意去延安。

3. 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间青年军团在鸡公山成立艺术队,经党组织派去余琦、张秉栋等人。

4. 青年军团结业前,刘汝明为军长的国民党六十九军邀请青年军团教官安翰华(党员,当时未发生组织关系)当参议,组成战地服务团,经党组织派去民先张秉栋(张化远)、徐淑民、朱诚等一批人去。

5. 还有一些组织派去作地下党秘密工作,如固始队去立煌集训时,留下王祥瑞(王瑞平,曾在鞍山钢铁公司工作,已逝世)任地下交通。一九四〇年三月政一队撤离阜阳时,留下秦××、朱流(女,曾在十一小学工作,已逝世)作为假夫妇担任地下联络工作。信阳队李其祥经豫皖苏区党委派出任潢川地下党特委副书记(后到新四军五师,解放战争时牺牲)。

一九三九年固始队的张时雨(张炎,曾任桂林、济南铁路局局长、政委等职)派到安徽军事训练团,商城队的马广智(李扬)派到大别山日报等……,以后都分别撤到我根据地。

6. 一九三八年三月青年军团派去山东和江苏敌后的人员,也有一定数量,但党员和“民先”不多。那时去江苏敌后的有党员俞铭璜、许家屯,“民先”有沈絮等,他们离开青年军团后已和当地组织发生联系,对其他参加我党我军的人的情况,缺乏了解。

总之,青年军团中的党组织开始由山东省委派出,而后在河南省委豫东南特委领导下,在青年军团中扩大了党的影响,发展了党的组织。青年军团结束组成实习队、政治队时党组织先后在豫东南特委、豫鄂皖区党委豫皖苏区党委领导下,在豫东南各县、皖北和皖东各县与地方党结合起来作了一些扩大党的影响,发展党的组织的工作,在有的地方留下了一些党的种子(在抓武装抓政权方面没有发生作用)。陆续地最后集中地把青年军团保留下来仅存的三个政治队带到我根据地来,为我党我军输送一批干部,这是一点成绩。但从当时的有利形势来看,组织工作远远没有跟上去。由于我们党的骨干,都是二十岁刚出头的年轻人(郭述申一九三九年过河南潢川时曾开玩笑说我们是一批娃娃干部),热情很高,政治水平很低,斗争经验很少,工作上缺点以至错误不少,这里不详加叙述了。

说明:以上是根据蒲澄(濮思澄)、李华(女)、张景华、王静溪(女)、庄重(庄坤)、杨光群(女)、王希克(王槐中)等人座谈整理,重要情节遗漏和不准确之处,请了解情况的同志特别是陈北辰、李德观、朱鸿翔等同志补充更正。王希克执笔,张景华校正

“政一队”与阜阳党组织

朱 鸿 翔

一九三八年底，我们“政一队”从河南商城来到阜阳，在上级党的领导下，我们开展了革命斗争：

一、“政一队”在阜阳的活动

我们“政一队”一行约七十余人刚到阜阳时，住在东关关帝庙里，以后又搬到城西北隅大观庙居住。第二次来阜阳住在西门里刘家祠堂。

“政一队”的前身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抗敌青年军团”。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把临战区的地方划分了若干战区。设在徐州的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由李宗仁担任司令长官，负责指挥着津浦线沿线的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的军事作战。抗日战争开始后，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华北、华东大片国土逐步沦陷。一九三七年十月至十一月间，北线日寇逼进济南，南线之敌自上海沦陷后，迂回包围南京，形势紧张，人民惶惶不安。当时，东北、平津一带的大批流亡学生和苏、鲁、豫、皖等省的大批知识青年，群集徐州周围，要求抗日图存。李宗仁和蒋介石早有矛盾，蒋想借日本人的力量消灭李宗仁，而李宗仁想趁机壮大自己的力量。于是李就利用这个时机，招收大批青年，组成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抗敌青年军团”（简称“青年军团”）。李兼任团长，参谋长张仁民任副团长，政治部主任潘宜之任教育长。李宗仁标榜“坚决抗日”，在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因此，广大青年也乐于参加该团。

青年军团组建后，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开赴豫东南的潢川城进行训练。全团学员三、四千人，分编为五个大队，其中一个女生队。李宗仁派张仁民、潘宜之主持训练。记得各大队长的军衔多为少将，只有个别的大队长军衔为上校。女生大队和一个男生大队住在潢川南城，其余三个队住在北城。

我们党早就觉察到李宗仁的意图，青年军团在徐州成立时，就派共产党员濮澄（原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副书记）、陈北辰（原任辽宁省副省长）等同志到青年军团做党的

工作。党又选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到青年军团。濮澄、陈北辰等同志到徐州后，与徐州的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到潢川时，由徐州党组织派人到潢川，与豫东南特委接上了关系。我们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地下工作的。

青年军团的学生中政治成份相当复杂，有共产党员、“民先”以及大批进步学生，同时也有特嫌分子、国民党员和落后分子，但大都是主张“团结抗日”的进步力量。在政治教官中也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如匡亚明、佟子实、张百川都是共产党员。因此，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还是进步力量占主导地位。

训练的主要内容，除军事训练游击战争外，主要讲抗战形势，如何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等。一九三八年初，训练基本结束，除第五大队作为军事队继续进行训练外，其余数千人重新编队，分赴抗日前线和豫东南各县工作，前者为山东队、江苏队、安徽队，各队人数不等。李宗仁想借大别山为依托扩大自己的势力，把豫东南八县——商城、固始、息县、潢川、信阳、罗山、光山、经扶（今新县），每个县各派一个中队，以县名为队名，每队约一百多人，并发给每人一支步枪，百余发子弹和两颗手榴弹。各队于四月中、下旬出发，开往各地。

我们商城队一百多人，四月二十日前后到达商城。队长由佟子实担任，熊兆祥、李其章两人分别担任区队长。队员分别到城关和各乡镇进行抗日宣传活动，还派人到当地驻军做工作。党的支部工作由马广智（李扬）、朱振祺二人负责，受中共豫东南特委的领导。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不仅在群众中做了一些宣传和组织工作，而且在队员中也发展了一批党员和“民先”队员。

一九三八年九月，日寇进攻武汉，侵占商城。商城队队长佟子实到老河口（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未归，尹莘野接任队长。由于战争的关系，队员中的少数不坚定者向武汉方向逃去。这时的商城队只有七十余人了，其中有二十多个共产党员和三十多个“民先”队员，不是党员和“民先”队员的也是坚定的进步分子。因此人数虽然大减，而队员的政治质量比例却大大提高了。队员们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在大别山中坚持打游击。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日寇退出了商城。我们商城队奉上级命令调往安徽省府所在地立煌整顿。整顿后，商城队改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工作大队第一中队（简称：政一队）。豫东南其他各队也分别改名为“政二队”、“政三队”……。一九三八年末，“政一队”被调到阜阳时，约有七十余人，二十多人是共产党员，其余多为“民先”队员，只有少数人是进步群众。

在立煌集训时，由豫东南特委把我们的组织关系介绍到安徽省委，到阜阳时由省委介绍到豫皖苏区党委。当时“政一队”特别党支部书记是贾世珍，副书记是朱鸿翔。到阜阳后，由贾世珍同志到豫皖苏根据地与区党委接上了关系。区党委决定以队内的党组织为基础，成立了中共阜阳工作委员会，贾世珍任书记，朱鸿翔任副书记，李岩、李震海、李文钦为委员。

阜阳当时是国民党（桂系）的专署所在地，是面向津浦路和徐州日伪军的前哨基地。专员郭造勋，四川人，虽是五路军的少将旅长，但因不是广西人，他在五路军的地

位并不巩固，随时有被撤换的可能。而“政一队”打的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旗号，又是李宗仁的“学生”，在五路军所辖地区很吃香，牌子硬，而且“政一队”人、枪齐全，政治质量高。因此，郭造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便将这批青年作为依靠利用的力量。所以在我们刚来时，他请我们吃饭，很多工作交我们去做。我们根据党的指示，利用郭的意图，来很好的开展党的工作，要抓政权、抓教育、抓军队、抓干部来开展我们的工作。因此，向他提出要两个区的政权，一是阜阳的涇溜区，二是临泉的滑集区，他都答应了，我们向他提出的各项工作建议，他也多数采纳。这两个区，从区长，区员到区队领导都是我们“政一队”的。当时派李岩到涇溜区任中心区委书记，秦玉林任区长；派李文钦到滑集区任区委书记，任慎修任区长。专署举办乡镇人员培训班，要我们参加，我们请示区党委是否参加？区党委指示：不仅要参加，而且要派得力人员去，把反动的东西变为进步的，为我们所用。因此，我们派贾世珍同志任大队教导员，派曾瑞林、蔡德新等同志任指导员；派马广智、徐侠民、李祥生、朱流、朱暇、梁淑君等同志到抗战中学任政治教员；我们还派熊兆祥、李其彰、张哲梅（奉明）、贺玉庆、刘冠民等同志到十一游击纵队工作，熊兆祥同志任政治部组织科长，张奉明任宣传科长，军衔均为少校；我们还办《淮涛》杂志，在杂志上除登抗日的战争消息外，就是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抗日民族战线的政策、时事评论，发动和启发群众的抗日觉悟和抗日必胜的信念；我们还办了大型墙报（在鼓楼洞里），多数每天一期或两天一期，内容多为抗日战争消息和诗歌散文、漫画等；此外，我们还经常举行报告会、演讲会、文艺晚会来进行宣传活动。

我们又抓动委会、工作团的工作。阜阳县动委会指导员马昌实，这个人比较反动，经过我们斗争，报省动委会撤换了马昌实，由宋晓春接任。临泉、蒙城动委会的指导员也撤换了，临泉县指导员由孟亚人接任，蒙城县动委会指导员由张亚非同志接任。

李岩等同志到涇溜集区队后，立即对区队进行整顿，撤换了区队副，发展了一个姓白的同志入党，后接任了区队副。这个白同志以后随我们撤退到豫皖苏根据地。

一九三九年七月，“政一队”和豫东南各县的政工队，奉命统一集中到立煌集训，集训于九月结束，后将八个政工队合编为三个队，即以原政一队加上信阳、固始两队，合并为“政一队”。其余五个队合编为新的政二、政三队。编后的“政一队”近百人，仍返回阜阳，新的“政二队”、“政三队”分赴全椒、寿县。

第二次到阜阳后，住在西门里的刘家祠堂，因为人员增加，大家又推选王愧中同志担任区队长。为了扩大工作地区，我们又向专员郭造勋提出在亳县要了两个区，派纵食力、马文干二同志任区长，并派了十多个队员去亳县工作，如：刘冠民、杜宝镜、杨光群等同志。

我们还接着办杂志《淮涛》，我们请李宗仁题写刊头，李宗仁误写成“淮流”二字。因此，本杂志即由《淮涛》改为《淮流》。原来《淮涛》是由李叔明（当时名李震海）任编辑，后来，由张景华、庄重等同志编辑。我在这个杂志上用“朱虹”、“鸿翔”、“老黑”等笔名写了一些稿件。这个刊物办得不错，曾受到彭雪枫、吴芝圃等同志的赞扬。它对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动员群众特别是青年坚持抗日起了积极的作

用。此杂志后来成为皖北特委的机关刊物。

二、“政一队”和阜阳县党组织的演变情况

来阜阳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至三九年三月，“政一队”特别党支部，书记贾世珍，副书记朱鸿翔。委员：李文钦、李震海。特别党支部隶属于豫皖苏区党委。

一九三九年四月，区党委决定成立中共阜阳工作委员会，书记贾世珍，副书记朱鸿翔。委员李文钦、李叔明、李岩。不久，区党委决定，阜阳县工委改为阜阳县委，委员还是上述几人组成。

一九三九年六月，中共阜阳县委书记贾世珍同志调走，县委书记由朱鸿翔担任，委员李岩、马广智、李文钦、李叔明。

同年秋，“政一队”返回阜阳后，区党委决定将“政一队”的党和地方党分开。“政一队”特别党支部书记王愧中，委员：刘斗奎、张景华、庄重。

中共阜阳县委书记朱鸿翔，组织部长李文钦，宣传部长李叔明，委员李岩。

一九三九年四月、五月，周季方同志来到阜阳，传达了区党委关于成立中共皖北特委的决定。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周季方同志必须有个公开的职业。经研究，准备利用周季方同志同任崇高是四川老乡的关系到抗战中学任教，以教书作掩护。于是周季方同志就到抗战中学西南角一个小院子里居住。我们把抗战中学的党员名单交给周季方，他在学校以政治教员的身份，领导皖北党的工作，我经常到周季方同志住处开会和联系工作。过了一些日子，周季方同志的爱人张建之和王鸿钧二同志也来到阜阳，他们三人都是皖北特委委员。韦学彬同志由县委交通转为特委的政治交通。这期间，周季方同志也曾与专员郭造勋有接触，进行过不少工作。

一九三九年冬，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周季方等同志被调回豫皖苏根据地。豫皖苏区党委决定成立阜、临、太中心县委，书记李轩，组织部长王宇（兼任临泉县委书记），宣传部长朱鸿翔（兼任阜阳县委书记），委员刘震邦（太和县委书记，现武汉市副市长）。我的记忆中，王愧中没有参加中心县委。因为王愧中当时是省青委委员、“政一队”党支部书记，他还负责领导“政三队”的党的工作和皖北的四个工作团的工作。当时上级还有规定，军队的党和地方的党分开。

有一次中心县委通知我去临泉开会。我到临泉后会议没有开成。中心县委没有孔小春同志，我和韦学彬同志（当时任中心县委政治交通员）都不记得有这个同志。

四〇年初，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高潮不断高涨。豫皖苏区党委决定：皖北的党，除少数身份没暴露，可以继续隐蔽工作的留下坚持工作外，大部分要撤退到根据地。并指示我们撤退要尽量动员广大进步青年、学生到根据地。我们根据指示，“政一队”队员便分批分期的陆续撤退，并把各人的枪弹带走。王愧中是比较后期走的。临走前，我们商议由我把尹莘野支配出去，以便王愧中把没有带走的枪弹全部带走。我找到尹莘野，约他到外边玩玩，他不去。又请他到饭馆吃酒他也不愿去，我俩只在外玩一会儿他非回来不可。回来时，碰到王愧中正在向小车上装枪。他没说什么，只长叹了一口气，就回屋